

学校编码: 10384

分类号_____密级_____

学 号: X200401002

UDC_____

厦 门 大 学

硕 士 学 位 论 文

“人生的艺术派的文学”

——论周作人的文学观

“Literature of Life's Artistic School”

——An Essay on Zhou Zuoren's view of Literature

梁白瑜

指导教师姓名: 李晓林 副教授

专 业 名 称: 文 艺 学

论文提交日期: 2006 年 10 月

论文答辩时间: 2006 年 11 月

学位授予日期: 2006 年 12 月

答辩委员会主席: _____

评 阅 人: _____

2006 年 10 月

厦门大学学位论文原创性声明

兹呈交的学位论文，是本人在导师指导下独立完成的研究成果。
本人在论文写作中参考的其他个人或集体的研究成果，均在文中以明确方式标明。本人依法享有和承担由此论文产生的权利和责任。

声明人（签名）：

年 月 日

厦门大学学位论文著作权使用声明

本人完全了解厦门大学有关保留、使用学位论文的规定。厦门大学有权保留并向国家主管部门或其指定机构送交论文的纸质版和电子版，有权将学位论文用于非赢利目的的少量复制并允许论文进入学校图书馆被查阅，有权将学位论文的内容编入有关数据库进行检索，有权将学位论文的标题和摘要汇编出版。保密的学位论文在解密后适用本规定。

本学位论文属于

1、保密（ ），在 年解密后适用本授权书。

2、不保密（ ）

（请在以上相应括号内打“√”）

作者签名： 日期： 年 月 日

导师签名： 日期： 年 月 日

厦门大学博硕士论文摘要库

内容摘要

在“工具主义”和“审美主义”并存的现代文论语境下，周作人作为启蒙思想者和文学家，他的文学观是企图融合两者的“人生的艺术派的文学”，它一面体现坚定的反封建启蒙思想，一面坚守着文学的审美本质。本文认为周作人的“人生的艺术派的文学”既是具人道主义与科学精神的人的文学，又是自律的、具贵族精神的文学。

顺应特定时代对文学启蒙功用的要求，周作人倡导“人的文学”，其中人道主义文学是从达尔文进化论出发，融合博爱型人道主义与个人主义，又经对尼采学说的扬弃，周作人放弃了对任何所谓“普遍真理”的信仰，再加以更多的返回传统和希腊、日本人对自然与美的热爱之情的滋润而成的。周作人对科学精神的重视，本文认为表现为他对文学“诚”与“真”的要求。诚，严肃，恳切之意；真，主观上要求作文一定要有真情实感，客观上的要求分成两部分——一是实事求是即符合“物理”，二是符合人性即“人情”，“物理人情”就是周作人评价文学的两大标准之一“常识”。

对文学审美本质的自觉追求，周作人寻找着文学自律之路，但他又终身不能真正解决“文学工具论”和“文学自主论”的矛盾，因此这条寻找文学自律之路显得异常的坎坷。文学的审美本质是超越，“超越”一词在周作人笔下更习惯于用“贵族”。周作人追求的贵族精神表现为他坚持文学“非实用而有远功”，即无“鼓动的力量”或“教训”之功而具人文关怀；同时他始终追求文学趣味（周作人评价文学的两大标准之一），也就是用诗意的文章语表达淡淡的“如橄榄或萝卜”的蕴藉含蓄之味。

关键词：人道主义；真诚；自律；贵族精神

Abstract

Living in the modern environment of literary theory where instrumentalism and aestheticism coexisted, the literature view of Zhou Zuoren, an enlightenment thinker and a writer, was an attempt to merge both doctrines in that of “literature of life’s artistic school”. It reflected steadfast anti-feudal, enlightenment thinking, while firmly guarding the aesthetic nature of literature. The author of this essay believes that Zhou Zuoren’s “literature of life’s artistic school” is literature of human characterized by humanitarianism and the spirit of science, as well as that of autonomy and the spirit of aristocracy.

Conforming to the demand by his specific time in history for the enlightenment function of literature, Zhou Zuoren advocated literature of human. The humanitarian component of that was started from Darwin’s theory of evolution, and formed through merging humanitarianism in the way of universal fraternity with individualism, subsuming the theory of Nietzsche, abandoning the belief of any so-called “universal truth”, adding more of the return to the tradition, and the nourishing by Greek and Japanese love of natural beauty. The emphasis on the spirit of science was reflected in Zhou Zuoren as the demand for sincerity and truth in literature. His “sincerity” meant seriousness and earnestness. His “truth”, in the subjective sense, required true feelings in a composition. In the objective sense, the requirement of his “truth” had two parts, one being seeking truth from facts, i.e., complying with “Wuli”, and the other being complying with humanity, i.e., “Renqing”. “Wuli-Renqing” was precisely one of the two major standards Zhou Zuoren used to critique literature, i.e., “common sense”.

Zhou Zuoren was seeking the road to the autonomy of literature, driven by his conscious pursuit of the aesthetic nature of literature. Throughout his lifetime, however, he was not able to truly solve the conflict between the instrumentalist theory and the autonomic theory of literature. Because of that, his pursuit of the autonomy of literature appeared to be unusually full of frustration. The aesthetic nature of literature is transcendence. Transcendence, in Zhou Zuoren’s writings, was more often referred to as aristocrat. The spirit of aristocracy that Zhou Zuoren was pursuing manifested as his insistence on literature being impractical but having long-term merits. In other words, literature lacked the power to incite or the function to instruct, but had humanistic concerns. In the meantime, Zhou Zuoren consistently pursued the delight of literature (one of the two major standards Zhou Zuoren used to critique literature), i.e., the use of poetic literary language to express the light and implicit delightfulness “reminiscent of olive or radish”.

Key words: Humanitarianism; Truth and Sincerity; Autonomy; the Spirit of Aristocracy

目 录

导 言	1
第一章 人道主义文学	4
第一节 “人”的文学	4
第二节 人的“文学”	10
第二章 科学与文学	19
第一节 “诚”与“真”	19
第二节 真诚文学	23
第三章 文学自律	28
第一节 “文以载道”和“诗以言志”	28
第二节 寻找文学自律之路	30
第四章 贵族精神	34
第一节 文学的平民精神与贵族精神	34
第二节 文学“无用”而有趣	38
结束语	46
参考文献	49

Contents

Introduction.....	1
Chapter 1 Humanitarian Literature.....	4
Section 1 Literature of HUMAN.....	4
Section 2 LITERATURE of Human.....	10
Chapter 2 Science and Literature.....	19
Section 1 Sincerity and Truth.....	19
Section 2 Literature of Truth and Sincerity.....	23
Chapter 3 The Autonomy of Literature.....	28
Section 1 Literature as the Carrier of Principles and Poetry as the Conveyer of Aspirations.....	28
Section 2 Seeking the Road to the Autonomy of Literature.....	30
Chapter 4 The Spirit of Aristocracy.....	34
Section 1 The Spirit of Populace and the Spirit of Aristocracy in Literature.....	34
Section 2 Literature Being Impractical but Interesting.....	38
Concluding Remarks.....	46
References.....	49

导 言

“审美自主主义”和“革命工具主义”并存是“五四”文论的突出特点：“中国的现代性文学理论话语既有西欧的影响（审美自主主义）也有东欧的影响（革命工具主义）”；“西欧文学理论的现代性表现为文学自主论对文学工具论的取代，它的主要任务是标划文学之不可侵犯的领地和文学自律存在的价值与意义；东欧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现代性则表现为新文学工具论对旧文学工具论的取代以及对新文学自主论的排斥，它的主要任务是论证文学之为科学意识形态教化工具的正当性。”[1]（P6）于是，中国现代文人在“文学自主论”的影响下，自觉地坚持文学的自主自律品格，以此反对“文以载道”的传统文学观；同时他们又都身处一个老大封建帝国的启蒙热浪中，因此在“新文学工具论”的指引下，又不由自主地将文学作为一种“新民”的手段。在新文化运动的热浪中，文学自主与工具论并存，度过了一个短暂的相安无事期。然而，此两者本是很难兼容的，因此历史终于还是驱使众人分化，许多人逐渐偏离“文学自主”而为“新工具理论”摇旗呐喊；少数人继续坚持文学自主论。周作人就是坚持文学自主论者中的一人。他拒绝所有的“棒喝主义”，警惕着一切所谓“普遍真理”。他顽固地坚持文学应具独立的品格，但同时他也清楚文学不可能天马行空，于是周作人试图融合二者，他提出“人生的艺术派的文学”这样的观点。这种文学观是建立在他的文学发展观上的。

周作人的文学发展观可以概括为：先有“孔子删《诗》定礼，夭阏国民思想之春华，阴以为帝之右助”；[2]（P6）接着“韩退之留赠后人有两种恶影响：一云道，二云文”；[3]（P150）再接着科举制度的专制和宋明理学的猖獗终于造就了“八股精神和三纲主义这两股无形的势力”，[4]（P518）严严实实地控制着整个中国社会；因此如今必须反对封建礼教，进行思想启蒙，用“诗言志”取代“文以载道”，才是中国人与文学的出路。

于是，五四时期周作人写下了许多具有开创性的文章，如：《人的文学》（1918年）、《平民的文学》（1918年）、《日本近二十年小说》（1918）、《论“黑幕”》《再论“黑幕”》（1919年）、《新文学的要求》（1920）、《儿童文学》（1920）、《个性的文学》（1921年）、《文学研究会宣言》（1921）、《美文》（1921年）、《新诗》（1921

年)、《文艺上的宽容》(1922)、《女子与文学》(1922年),以上是文论方面的文章;此外还有至少8篇有关新村的文章和1919年《祖先崇拜》、《思想革命》等启蒙之作。终于周作人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竖起了一面面空前的醒目的大旗——人、个性、子孙、儿童、女子、美文、新诗、新村。舒芜在几十年后的1986年回想起来,还说:“(周作人)在‘五四’新文学新文化运动中作出了多方面的贡献,都是当时最高的水平,没有人超过他,没有人能代替他。”[5](P6)

然而,大有“横刀立马”之势的周作人却在1923年抛出《自己的园地》种起了“蔷薇与地丁”,紧接着1924年发表《教训之无用》,1925年再来一篇《元旦试笔》宣告“关闭文学店”,1928年更是以《闭户读书论》宣布退出文学舞台。

当时的人们惊愕于一个思想先锋、文学革命者的突变:“叛逆”成了“隐士”?可是,我们后人返观历史,看到三十年代的周作人其实正在整合自己的文艺思想,于是有《文学的贵族性》(1928年)、《文学与常识》(1929年)、《论八股文》(1930年)、《草木虫鱼·小引》(1930年)、《关于通俗文学》(1932年)、《中国新文学的源流》(1932年)、《关于写文章一、二》(1935年)、《中新文学大系一集·导言》(1935年)、《自己的文章》(1936年)、《文学的未来》(1936年)等等更加成熟的文章发表。

到了四十年代,周作人更多地从文化思想角度对中国文化、文学进行深入的思考、剖析和建设:1940年发表《启蒙思想》《汉文学的传统》、1941年写有《中国的国民思想》、1943年又有《中国的思想问题》《中国文学上的两种思想》《汉文学的前途》、1944年一口气写下《女人的文学》《新中国文学的复兴之途径》《文学杂谈》《论小说教育》《苦口甘口》、1945年又作《两个鬼的文章》《道义之事功化》《梦》和《文学史的教训》。

之后,周作人就少有文论与创作发表了,他更多地投身于翻译事业。

通常对文学为什么的问题上有两种看法:一是为人生,一是为艺术;而周作人却试图融合文学在中国现代的启蒙之功与文学自身的审美之本为一体,倡导“人生的艺术派的文学”观。1920年《新文学的要求》和1922年的《自己的园地》先后具体阐释了该观点。

“著者应当用艺术的方法,表现他对于人生的情思,使读者能得

艺术的享乐与人生的解释。这样说来,我们所要求的当然是人生的艺

术派的文学。” [2] (P45-46)

文学对著者而言，必须兼顾“艺术的方法”和“人生的情思”；对读者而言，必能兼得“艺术的享乐”和“人生的解释”。在《自己的园地》中周作人进一步明确反对“为人生的艺术”和“为艺术的艺术”：“‘为艺术的艺术’将艺术与人生分离，并且将人生附属于艺术……；‘为人生的艺术’以艺术附属于人生，将艺术当作改造生活的工具而非终极，也何尝不把艺术与人生分离呢？我以为艺术当然是人生的因为他本是我们感情生活的表现，叫他怎能与人生分离？”[2](P63)从而得出结论：

“以个人为主人，表现情思而成艺术，即为生活之一部，初不为福利他人而作，而他人接触这艺术，得到一种共鸣与感兴，使其精神生活充实而丰富，又即以为实生活的基本；这是人生的艺术的要点，有独立的艺术美与无形的功利。” [2] (P64)

这就是身兼启蒙者与文学家的周作人的“人生的艺术派的文学”观：艺术与人生不可分离，艺术是“独立的”而具有“无形的功利”。章培恒说：“这‘人的艺术派的文学’，也就是‘以人道主义为本’、‘以艺术为究极的目标’的文学。”^① [6] (P9)

“人生”和“艺术”是周作人的文学观的两大支柱，关乎“人生”的人道主义、科学理性和“艺术”所包含的独立品质、贵族精神正是其中的四个要素。一句话，具人道主义与科学理性的人的文学、自律而又具贵族精神的审美超越的文学，这就是周作人的文学观。

^① 出自章培恒为《一个中国人的文学观》译本所作的序《浅谈周作人文艺思想研究的重要性》，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

第一章 人道主义文学

周作人的“人生的艺术派的文学”首先是人道主义文学，它从“人”的文学走向人的“文学”。周作人文学观的重心从“人”到“文学”的转移是客观存在的，但两者他都不曾放弃，它们共同构成他的人道主义文学。对人道主义文学的提倡之功，用余虹的话来说就是：“周作人还首次集中而明确地阐述了新文学应当书写的内容——人道主义，这便将自梁启超到胡适悬空倡导的文学内容的革命落到了实处。”[1]（P89）

人道主义文学观的形成与发展，本文分成四步来讲：第一步，周作人从达尔文进化论出发，将“人”定义为“从动物中进化而来的”，人性等于“神性+兽性”；于是，第二步周作人提出他的人道主义就是代表“神性”的博爱型人道主义与出于“兽性”的个人主义的结合，因此人道主义文学是“人”的文学”；第三步，经过对尼采学说的扬弃，周作人放弃了对任何所谓“普遍真理”的信仰，于是他更加自由与宽容；第四步，再加以更多的返回传统和希腊、日本人对自然与美的热爱之情的滋润，周作人将生活艺术化着，此时人道主义文学更倾向于人的“文学”。

第一节 “人”的文学

在西方发现“人”的五百年后，中国还是一片“人荒”，这不能不说是中国人的耻辱，但“辟人荒”时代的到来，又不能不说是一件振奋人心的事。“正像周作人所说，在中国‘大家都做着人’——已经‘做’了几千年，还要继续‘做’下去，却不知‘几乎都不知道自己是人’，不知道‘人’是怎么一回事儿；直到接受西方文化的启迪，经历了五四思想大解放，才经由周作人这一代先驱者的努力，达到了上述自觉认识；这实在是中国‘人’的觉醒史、发展史上应该大书特书的破天荒的大事。”[7]（P7）

此时周作人那篇不足六千字的《人的文学》^①以其思想上符合时代的启蒙要求，理论上具有相对系统性与严密性，在思想界和文论界同时引起了巨大反响。这篇

^① 1918年12月发表于《新青年》5卷6号上。

文章，概括起来就讲三个词：“人，人道，人的文学”；拓展开就三句话：“人是一种从动物进化的生物”；人道主义是“一种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用这人道主义为本，对于人生诸问题，加以记录研究的文字，便谓之人的文学。”[2](P31-39)

“人是一种从动物进化的生物”这个观点来自于达尔文的进化论。进化论对二十世纪初的中国人影响之大很难用语言表达。“我们可以说，再没有比进化论对近代中国人的思维体式所产生的影响更大，更深远的思想学说了。”[8]

(P196) 1898年严复译《天演论》，一代人争相传阅，书中说：“自禽兽以至人，期间物竞天择之用，无时而或休，而所以与万物争存，战胜而种盛者，中有最宜者在也。是最宜云何？曰独善自营而已。夫自营为私，然私之一言，乃无始来。”“是故凡属生人，莫不有欲，莫不求遂其欲。其始能战胜万物，而为天之所择以此；其后用以相贼，而为天之所诛亦以此。何则？自营大行，群道将息，而人种灭矣。”[9](P61)

这几句话，对中国人的思想的改变是根本性的。我们读出人是从禽兽进化而来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人皆有欲；对人类来说，成也自私，败也自私。于是，首先，人们学会了用科学的进化论方法来看待人类，而不是佛家所谓的“轮回说”。其次，它教会人们，要生存就要竞争，唯有进步，才不会被淘汰；个人是这样，民族也是这样，国家同样是如此。最后，它使得人们懂得“欲望”、“自私”都是人的本能。周作人说“个人的自觉的根本在于进化论的人生观”，[10](P314)“人的文学”观深深扎根于进化人性论。

人是“动物进化”而来，人性等于“兽性+神性”；“肉的一面，是兽性的遗传；灵的一面，是神性的发端”，一句话“人有灵肉二重的生活”。因此不管是“灭了体质以救灵魂”还是“不顾灵魂的快乐派”，都“不能说是人的正当生活”；出于兽性，欲是其本能，自私也是理所当然的；出于神性，应该“爱人如己”，“关于物质的生活，应该各尽人力所及，取人事所需”，于是，周作人进一步提出伴随人而生的“人道”就是对应于人的“灵肉二重性”的博爱型人道主义与个人主义的结合，统称为人道主义。文学不论是“写这理想生活，或人间上达的可能性”还是“写人的平常生活，或非人的生活”都是人的文学。所以新文学应该提倡的是“人的文学”，应该排斥的是“非人的文学”。“用这人道主义为本，对于人生诸问题，加以记录研究的文字，便谓之人的文学”，这种“人的文学”就是“人

道主义文学”，就是“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的文学”。[2]（P31—39）对人道主义的倡导正是继晚清国家主义思想启蒙之后的五四思想启蒙的主潮。

我们先了解一下人道主义的含义。美国科利斯·拉蒙特甚至说：“广义地说，每当一个思想家（不论他属于哪个领域）把人的现世幸福看得至高无上的时候，他便涉入了人道主义的领域。”[11]（P28）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几乎无法定义的人道主义，但我们看出两个关键词：人、现世。是的，周作人的人道主义正是关心现世的人的人道主义，它融合着人道主义和个人主义，“个人主义与人道主义无非是一物的两面，并不是两件东西。”[10]（P312）具体而言是托尔斯泰的博爱型人道主义、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共产主义、日本的新村理想和蔼理斯、樋川白村的个人主义合成的结果。

托尔斯泰的博爱主义文艺观是一种宣传基督博爱教义的全人类的文学，尤其颂扬朴素的民间艺术。周作人在接受着托氏的博爱观、全人类视角、对民间艺术的重视的同时，他并不满意托尔斯泰的无我的观点，他认为托尔斯泰提倡极端的利他，抹煞了对自己的责任。既强调人类又强调自我的观点，可以说是周作人思想的特点之一。而克鲁泡特金认为人的本能是互助的、性善的，人类社会应该发展成分散的、非政治的、合作的社会，人们不受政治、宗教、军队的干预，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的共产主义社会，这种“社会协爱”理想，“具有很浓的空想社会主义色彩，与具有温和个性的周作人一拍即合”。[12]（P111）克氏的“率真”虚无者论对周作人的影响可能更大。早在1907年周作人就说：“克氏传中（四章第十二节）又为浅说，谓虚无论者，行贵率真，最嫉文明习惯的虚伪。……凡诸外观之雅，出于虚伪者，皆为虚无论者所拒。”“虚无主义纯为求诚之学，根于唯物论宗，为哲学之一支，去伪振敝，其效至溥。近年吾国人心，虚伪凉薄极矣，自非进以灵明诚厚，乌能又济？”[13]（P46—48）周作人正是以率真、灵明诚厚为疗治“虚伪”的妙药。此时，周作人的启蒙思想已经不仅“立人”而已，他追求的还是高尚的人了。

如果说来自俄国的是颇具空想社会主义色彩的理论，那么发生在20世纪初的日本新村运动则几乎是空想社会主义的实践。日本新村是20世纪初，武者小路实笃为首的《白桦派》同仁，在日本日向建立具有空想社会主义性质的日向新村。它“主张泛劳动，提倡协力的共同生活，一方面尽了对于人类的义务，一方

面也尽各人对于个人自己的义务；赞美协力，又赞美个性；发展共同的精神，又发展自由的精神”。[13]（P101）此种主张极大地吸引了周作人，他以一生都少见的热情参与、介绍和推广新村理想。罗钢认为新村主义对“人的理想生活”的倡导直接启发了周作人‘人的文学’观念的提出，为人道主义从一种思想模式转化为社会模式的可能性，提供了一种现实的依据；为周作人思想中原有的个性主义，人道主义等不同因素的统一融合提供了一个完整的理论构架。^①这种说法本文认为不很妥当。的确，新村主义以其对“人类与个人”的同等重视，深深地契合了周作人博爱型人道主义与个人主义统一的人道主义文学观，但周作人提出“人的文学”是在吸收了人道主义、个人主义、进化论（它们的影响比新村来得早）和针对中国人“非人”的生存状况、中国文学的多“非人的文学”现状提出的；至于人道主义与个人主义，在周作人眼里它们根本就是不冲突的——它们融合在“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中”——而无须再融合。当然后来周作人还是放弃了新村主义，可他始终珍爱那种“使世间更为‘人类的’，又更为‘个人的’”新村精神”。[13]（P130）

如果说以上三者更倾向于博爱一面的话，那么周作人得之于蔼理斯和厨川白村的影响就更突出个人了。相对人道主义的宽泛含义来说，个人主义的内涵是比较清晰的。《大不列颠百科全书》“个人主义”下注：作为一种总的态度，个人主义包括高度评价个人自信、个人生活和对他人的尊重。[14]（P8-356c）可见，个人主义本就不排斥人道主义，它含有人道主义因素。

蔼理斯和厨川白村都是有名的个人主义者。蔼理斯，这位英国著名的性心理学和文艺批评家，罗钢评价他是“顽强的个人主义”。蔼理斯说：“我们文明生活里的一切倾向”“都朝着个人主义”他还批评社会改革者“常常忘记了前者（社会进步）仅仅是后者（个人发展）的手段”。[15]（P27）而另一个个人主义者厨川白村也曾写下了这样的话：“非常强烈地主张自我之解放与个人的自由之倾向远导源于文艺复兴时期异教思想勃兴时……直至最近，复更为有力，总之，今日的一切权威，破坏一切传统，以清新强烈的自我为基础而创造新生活。”[16]（P106）他们追求个性解放的思想极大的影响着周作人。我们还应注意到这两位追求个性者，同时又都不是偏激的个人主义者，他们在强调个性的同时总还是兼顾着人类，

^① 见罗钢的《历史汇流中的抉择：中国现代文艺思想家与西方文学理论》，第23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

这种思想，上文说过它正是周作人思想的特点之一。周作人多次引用蔼理斯的话：

“在道德的世界上，我们自己是拿光明使者，那宇宙的顺程即实现在我们身上。……我们手里持炬，沿着道路奔向前去。不久就要有人从后面来，追上我们。我们所有的技巧，便在怎样的将那光明固定的炬火递在他的手内，我们自己就隐没到黑暗里去。”[10]（P170）此段话虽略有悲观之意，但也可见出人与人是相互的，个人总是生活于人类川流不息的长河中。蔼理斯或许还表达得有些隐晦，厨川白村就明确得多了，他说：“若不是偏狭固陋的利己主义而为真正个人主义的自由活动，那末与社会的民族的共存主义决不是不相容的；并且还是为着自己的家族，国家及一般人类而积极地从事于自我中心的努力。换言之，那发挥自己的全力以谋自我的满足，在其自身，实不外以热情为同胞尽力。这便是真正个人主义与利他主义的契合点”[16]（P109）

融合了个人主义与人道主义，周作人提倡的人道主义是“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他倡导的文学是“个人——人类统一的人道主义”文学。^①周作人多次对自己的这种人道主义文学加以阐释：“这人道主义的文学，实质就是个人主义以人类之一的资格，用艺术的方法表现个人的情感，代表人类的意志，有影响于人间生活幸福的文学。”[2]（P47）“个性是个人唯一的所有，而又与人类有根本上的共通点；个性就是在可以保存范围内的国粹，有个性的新文学便是这国民所有的真的国粹的文学。”[2]（P53）“现在讲文艺，第一重要的是‘个人的解放’，其余的主义可以随便；人家分类的说来，可以说这是个人主义的文艺，然而我相信文艺的本质是如此的，而且这个人的文艺也即真正的人类的——所谓的人道主义的文艺。”[2]（P65）从这三段话，我们可以归纳出人道主义文学的内涵包括：文学既要是人生的又要是艺术的；文学要有个性；文学是个人文艺也即是人类的文艺。

如果说人道主义倾向于利人，个人主义倾向于利己的话，在周作人眼里，利人与利己也是看似相对实则相辅的。“彼此都是人类，却又各是人类的一个。所以须营造一种利己而又利他，利他即是利己的生活。”个人与人类的关系就如“森林中的一株树木，树木盛了，各树也都茂盛。但要森林盛，却仍非靠各树各自茂盛不可。……个人爱人类，就只为人类中有了我，与我相关的缘故。”[2]（P33）

^① 这是罗钢的说法，见《历史汇流中的抉择：中国现代文艺思想家与西方文学理论》，第25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

Degree papers are in the "[Xiamen University Electronic Theses and Dissertations Database](#)". Full texts are available in the following ways:

1. If your library is a CALIS member libraries, please log on <http://etd.calis.edu.cn/> and submit requests online, or consult the interlibrary loan department in your library.
2. For users of non-CALIS member libraries, please mail to etd@xmu.edu.cn for delivery details.

厦门大学博硕士论文摘要库